

■ 思想政治教育

关于孔子的道德教育学说探析

黄 钊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黄 钊(1939-), 男, 湖北黄梅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教授, 中外德育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思想道德教育研究。

[摘 要] 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学说体系包括: (1)提前以德治为目标的道德教化构想; (2)设计关于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 (3)塑造具有民族特色的君子人格; (4)倡导循循善诱式的道德教育方法; (5)确立自我修身的一系列重要原则等。

[关键词] 孔子; 儒家; 道德教育; 学说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4)01-0114-05

孔子是我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创始人, 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道德教育方面, 孔子构建成博大精深的学说体系, 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造, 对 2500 年来我国道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产生过无比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就孔子的道德教育学说体系作尝试性的理论探析, 以就教于海内外儒学专家们。

一、关于以德治为目标的道德教化论

孔子进行道德教育的目标, 在于把全社会的人们引上德治的轨道。为了实现德治, 他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要求统治者做到“为政以德”, 二是主张对被统治者实行“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这两方面结合起来, 体现了孔子关于道德教化的理论构想。

首先, 孔子要求统治者做到“为政以德”。他曾说: “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 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下引此书, 只注篇名)。旨在告诉当政者, 若能做到“为政以德”, 就能赢得民心归附, 突出了“德政”的重要性。孔子认为, 能否实行“德政”, 关键在于当政者能否发挥表率作用, 自觉地以身作则, 处处对老百姓言传身教。他说: “政者, 正也。子率以正, 孰敢不正?”(《颜渊》)认为执政者的头等大事, 就是要做到自身端正。又说: “苟正其身矣, 于从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 于正人何?”(《子路》)又说: “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子路》)这都深刻说明了正人必先正己的道理。可见, 为了实行“德政”, 当政者必须严以律己, 做到以德感人, 以德教人, 以德正人, 一句话, 就是坚持“为政以德”。

其次, 孔子主张对被统治者实行“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孔子把德教与刑治加以比较, 强调德教优于刑治。他说: “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为政》)这里所谓“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讲的是刑罚约制(简称“刑治”); 所谓“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讲的是德礼教化(简称“德教”)。在孔子看来, 刑治虽然可使老百姓免除犯罪, 但却留下“无耻”的后遗症。“无耻”就是没有起码的道德自觉, 这是最为可怕的结局; 而德教则既能使老百姓产生道德自觉(“有耻”), 又能使他们不

超越社会规范(“且格”)。显然,孔子是主张对老百姓实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礼教化。

所谓“道之以德”,就是主张用道德教化来引导老百姓遵守社会道德规范。所谓“齐之以礼”,就是主张用“周礼”来规范老百姓的言行,以便推动全社会照“周礼”办事。孔子一方面要求统治者坚持“为政以德”,另一方面又强调对老百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难看出,其总的目的在于使全社会的人们走上德治的轨道,显示了道德教育为政治目标服务的鲜明特征。

二、关于思想道德教育内容的总体设计

孔子为了实现对老百姓“道之以德”,在道德教育内容方面进行了总体设计。其突出贡献,是创建了以“仁”为核心内容的道德范畴体系,从而为儒家道德教育内容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其范畴体系中,“仁”是最高德目。以“仁”为统帅,又辅之以义、礼、忠、恕、孝、悌、慈、爱、勇、温、良、俭、让以及恭、宽、信、敏、惠等一系列具体德目。为了理解孔子所构建的道德范畴体系,我们必须弄清“仁”与其它道德范畴的关系。

首先,“仁”,是孔子一再强调的具有统帅作用的道德范畴。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也。”(《里仁》)其所渴求的“道”,主要就是“仁”道。孔子的最高理想,就是“天下归仁”。

其次,“义”与“礼”都是仅次于“仁”的重要德目。孔子曾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这里告诉我们,“义”,是君子应具备的内在素质,而通过“礼”去施行它。所以,做到了“礼”,也就体现了“义”。如前所述,“礼”是奴隶主贵族内部的行为规范,旨在维护奴隶制等级秩序。孔子所向往的政治目标,就是“克己复礼”,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所以,“礼”的实施,也是“仁”德的基本要求。

再次,“忠”与“恕”也是与“仁”相通的重要德目。孔子曾告诉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释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具体地说,积极为他人,谓之“忠”;忖己度物,不加害于人,谓之“恕”。《中庸》曰:“忠恕违道不远”。“忠恕”之所以违道不远,是因为它符合“仁”的要求,孔子所讲的“忠恕之道”,都同关爱他人相关,因而也是“仁”的体现。

“孝”与“悌”也是与“仁”相贯通的重要德目。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一语,就揭示了这一关系。孝悌之道之所以是“仁”德之本,是因为它们从根本上体现了“爱人”的要求。我们知道,“孝”的基本内涵,是孝敬父母,强调的是儿女对父母的“爱”;“悌”的基本内涵是友爱兄弟,强调的是兄弟间的互“爱”。在孔子看来,只有先做好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然后才有可能关爱他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孝”、“悌”乃为“仁”德之本。

最后,“恭、宽、信、敏、惠”等五德也是“仁”的内在要求。“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此五德之所以能体现“仁”的要求,是因为它们都内涵着“爱人”的旨意。“恭”,是对他人的恭敬、礼让;“宽”,是对他人的宽厚、宽恕、宽容;“信”,是对他人诚实不欺;“敏”,是为社会办事敏捷、有成效;“惠”,是能给他人以实际利益、恩惠。不难看出,它们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对他人的“爱”,因而同“仁”德相贯通,体现了“利他”精神。孔子把以“仁”为核心内容的道德范畴体系作为其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体现了他的道德取向与价值追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关于塑造具有民族特色的君子人格

在道德教育方面,孔子十分重视高尚人格的塑造,通过创造人们共同景仰的人格范型,引导社会成员攀登崇高道德境界。孔子所向往的高尚人格,是“圣人”、“贤人”、“志士”、“仁人”、“君子”等。在这几类人格范型中,“圣人”居于最高层次,“君子”居于较低层次。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基于这一认识,孔子特别重视君子人格的塑造。为了塑造“君子”人格,孔子进行了一系列思考。

其一,从不同侧面对“君子”应当具备的德行提出种种界定,以引导人们照着去做。首先,君子必须具备“仁”德。孔子指出,君子必须“仁以为己任”(《泰伯》)、“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里仁》)、“君子去仁,恶乎成名?”(《里仁》);其次,君子必须注重德的综合修养。指出:“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雍也》)、“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这些论述,不仅强调了君子要以“义”作为自己的内在素质,要按照“礼”去实行并约束自己,还要以“信”来成就自己,以“博学”(“知”)来丰富自己。这说明“君子”必须进行“仁”、“义”、“礼”、“智”、“信”等优秀品德的综合修养。

其二,运用量化方法对君子的言行举止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强调“九思”,他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二是强调“君子”应当“尊五美”,所谓“五美”,指的是:“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三是强调“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四是强调“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礼记·杂记下》)五是强调“君子有五耻: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众寡均而倍焉,君子耻之。”(《礼记·杂记下》)这些以量化为特征的概括,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君子修身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这对于人们培育君子人格,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其三,运用对比法,将“君子”与“小人”之德行加以比较,藉以说明君子之德的高尚性,小人之德的卑贱性,以激励人们争作“君子”,不作“小人”。如,孔子曾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等等。通过这些比较,突出了君子与小人在德行品性上的差距。这在当时,对于推动人们自觉树立君子的高尚人格,避免陷入“小人”的污浊境地,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注重塑造“君子”人格,这是孔子在道德教育中创造出来的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德育模式,对于我国古代道德建设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它通过塑造君子人格范型,敦促全社会、全民族的人们为做君子而修身正心。这对于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准,促进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无疑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四、倡导“循循善诱”式的教育方法

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有自己独到的道德教育方法。他的学生颜渊曾深有体会地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子罕》)这里明确谈到了孔子教育方法的特点是“循循然善诱人”。用今天的话说,属于“启发式”教学法。综观孔子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注重“因材施教”。所谓“因材施教”,就是从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注入特定的教育内容。例如,《为政篇》载: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撰,曾是以孝乎?’”

这里分别记述了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等 4 人关于“孝”的提问,而孔子的回答却不一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几位学生关于“孝”的误区各不相同。懿子不懂孝道,表现为“违礼”;武伯不懂孝道,表现为常使父母担忧;子游不懂孝道,表现为不能敬重父母;子夏不懂孝道,表现为不能对父母和颜悦色。孔子的不同回答,正是对症下药,因材施教。又如,《先进篇》载:子路和冉有曾分别向孔子请教关于“闻斯行诸”的问题,孔子的回答也不一样。他回答子路时说:“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诸?”而回答冉有

时,则果断地说:“闻斯行诸”。对于孔子的两种不同回答,其学生公西华感到不可理解,便向孔子请教,孔子曰:“求(冉有)也退,故进之;由(子路)也兼人,故退之。”此处一“进”一“退”,亦是对症下药,因材施教。因材施教从哲学方法论上讲,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因而是针对性和启发性都很强的教育方法。

二是倡导“举一反三”法。所谓“举一反三”法,指的是教育者在施教过程中,启发学生运用类推式的逻辑思考,从老师所讲的同类事物中的一例,推及同类事物中尚未讲到的其它诸例,以达到认识该类事物目的的教育方法。孔子曾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这是说,老师在教育中,举出“一隅”为例(以启发学生由此一隅而联想推及其它三隅),而有的学生不动脑子,竟然不能从此“一隅”而推及其它“三隅”,这说明该生不可教,故“不复也”。这里旨在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促其能由此及彼,“举一反三”。

三是倡导“愤启悱发”法。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言下之意,是说“愤”则启,“悱”则发。我们将它简称为“愤启悱发”法。朱熹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据此可知,孔子是说,只有当着学生在探求某种道理而未达到目的时,老师才予以开导指点,使之得其真义;只有当着学生欲言而又找不到表达思想的词语时,老师才可以提示以促其用辞通达。否则,不予以启发。可见,“愤启悱发”法,强调的是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当学生求通而不能通、求达而不能达时,老师才予以启发诱导。

四是重视思想交流法。孔子非常重视与学生平等地交流思想,并在平等交流中,对学生予以启发诱导。这种情况,在《论语》中多有记载。如《公冶长篇》: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

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这段文字,记载了孔子同其学生颜渊、子路相处之时相互交流思想的情况。当时,师生畅谈自己的志愿:子路的志愿是,希望出入有车马,衣服有轻裘,并将这些与朋友共享之,即使被损坏,也不为之遗憾;颜渊的志愿是,不奢谈自己的长处,不施加劳役于人。孔子的志愿是,使老者能够安享晚年,朋友能够相互信任,青少年能够怀之以德。三人志向各有不同,但孔子之志具有“圣贤气象”,能引人入胜。故二程评曰:“先观二子之言,后观圣人之言,分明天地气象。”这说明孔子通过同学生平等交流志愿,努力将学生之志引向更高境界的情况。

五、确立自我教育的一些重要原则

孔子不仅强调教育者对被教育者要施以“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而且十分重视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他把自我教育称之为“修己”,强调“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曾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因此,孔子十分重视“修己”(即自我教育)。围绕“修己”,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原则。

一是提倡学思并重。在修身中,孔子非常重视“学”与“思”,主张两者并用,相互补充。他所说的“学”与“思”,虽然也涉及对一般文化知识的学习与思考,但就其主要倾向而言,多指道德修养方面的自学与深思。首先,他强调“学”,指出:“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不学礼,无以立”(《季氏》),明确把“学”看做做君子 and 立身的先决条件。其次,孔子也强调“思”,主张把学与思结合起来。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了阐明“思”的范围,孔子还提出了“九思”(已于前述)的原则,主张从9个方面来发挥“思”的功能,借以反省和检查自己的言行,看它们是否符合道德要求。

二是主张慎言力行。所谓“慎言力行”,就是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努力将道德行为准则付诸实践。孔子曾说:“力行近乎仁”(《中庸》);“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子路》)“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在言与行孰先孰后问题上,孔子明确主张“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孔

子还强调言行一致,曾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在修身方面,孔子也不懈地探求,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学而》)这里告诉我们,孔子从 15 岁就立志求学,但直到 70 岁才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这个境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心所欲”,二是“不逾矩”。“从心所欲”,指的是在适应社会规范方面,获得了自由;“不逾矩”,指的是在行为方面不越出社会规范。既能“从心所欲”,又能“不逾矩”,这表明孔子修身取得了很高成就。

三是强调见利思义。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这是人们在修身中回避不了的问题,必须面对现实,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对此,孔子也有自己的独得之见,主张“见利思义”或曰“见得思义”。所谓“见利思义”,指的是在取“利”之前,必须以“义”为尺度来衡量,看所得之“利”是否符合“义”的要求。孔子认为,凡符合“义”的“利”可以获取;凡不符合“义”的“利”,则不能获取。这也就是后来荀子所概括的“以义制利”的意思。正是基于这一主张,孔子曾明确强调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按:‘得’疑为‘去’字之误)之,不去也。”(《里仁》)这里强调的正是“以道制欲”之意。孔子并非不要富贵,只是他强调,在取得富贵时,应不违背道义。他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也正是鉴于这一点,孔子曾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可见,孔子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有自己的基本原则。

四是提倡“杀身成仁”。孔子认为,高尚道德的价值重于个人的生命。为此,他大力提倡为维护高尚道德而英勇献身的精神。曾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种“杀身成仁”的道德取向,为儒家修身学说提出了最高要求。

以上我们从 5 个方面概括阐述了孔子在道德教育领域所作的杰出理论创造。这些理论创造,对我国后来的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后来孟子、荀子以及秦汉以降历代儒家学者,虽然思想道德教育体系各有所别,但在基本倾向上,都同孔子思想保持一致。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正在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正在日益加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认真发掘和继承孔子关于道德教育学说的积极成果,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对于推进全人类的文明进步,都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叶娟丽)

Approach to Confucian Doctrine of Moral Education

HUANG Zhao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HUANG Zhao (1939-), mal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thinking and moral education.

Abstract: Confucius, as the founder of Confucianism in ancient China, great thinker and educator, made great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He built in the field of moral education a characteristic system of doctrine, which h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our moral education for over 2 500 years, and is now of much practical value. First, Confucius posed the idea of moral education aiming at ruling by morality. Secondly, he ingeniously designed the elementary content of moral education. Thirdly, he placed emphasis on cultivating sage personality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Fourthly, he advocated the method of educating with patience. Last, he established important principles of self-educating.

Key words: Confucius; Confucian; moral education; doctrine